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态势与政策思考

北京社科院举行第 34 期公共政策学术沙龙

■ 陆小成 北京社会科学院

近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第 34 期公共政策学术沙龙在院六层会议室举行。本次沙龙的主题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态势与政策思考。由北京社科院青年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市情调查研究中心、北京世界城市研究基地共同举办,北京市市情中心副主任陆小成博士主持。北京市市情中心主任、北京世界城市研究基地秘书长唐鑫作为学术顾问对本次活动进行点评和指导。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情中心李茂博士以《当前经济形势的表征与内在因素分析》为题进行了报告。该报告通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克强指数、工业统计指标、经济景气指数以及其他变量,如民间借贷、啤酒销量、互联网金融等图表表明,中国经济持续减速。但是伴随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中国的影响力在与日俱增。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在于:上届政府的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虽然避免了当时的经济危机,但是将许多问题遗留到本届政府,如政府债务过大、腐败、房地产价格过高、国进民退、社会整体负债率过高等。目前本届政府的经济政策其实也比较明确,就是牺牲短期的利益换取长期的利益,以最近两三年经济形势稍微差一点,来解决整个社会中一些结构性问题,为未来经济的长期增长做好铺垫。

李茂博士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态势也展现了许多新亮点,如上半年快递服务企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1195.7 亿元,同比增长 33.2%;保险行业上半年实现保险保费收入 13702.53 亿元,同比增长 19.27%;北京、青岛、厦门、上海等二手房成

交同比上涨 60—115%;娱乐业、旅游业特别是在线旅游、软件业、移动互联网通信、科学研究等产业保持较高增速。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情中心何仁伟副教授认为,当前中国的人才、资本流失非常严重是导致经济下滑的重要原因。由于房价太高,工资收入与房价差距太大,特别是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与国际同类城市相比,我们的收入低,但房价高,说明民生问题比较严重。如东京已经达到现代文明程度,在立体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利用等方面城乡差距不大,但我国城乡差距太大,导致内需不足。中国要解决经济增长缓慢等多方面问题,需要有信仰、有创新、有责任心。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情中心李晓社博士认为,这个主题比较大,但是应时,他将自己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拿出来与大家分享:第一,经济下滑是有一定预期的,例如,“十二五”GDP 增速是 7%,从目前看,过去的近五年是可以实现这个目标的。第二,经济下滑的机遇是应进入全面调质的阶段。这个阶段会很艰难,很漫长,顺利则可以较快进入另一个经济常态。第三,国内外有一些观点认为,中国正在输出衰退。我觉得有点唱衰中国发展的意味,退一步讲,应该是全球进入衰退期,全球化促使相互输出衰退。相比较而言,中国的经济下滑具有一定稳定性,而欧洲或美国等西方国家衰退具有动荡性。比如,欧洲面临的大规模难民问题,实质是美国为首的国家战争与民主输出而致,只要这种情况不停止,战争、贫困等难民会更多。可以预见,未来的欧洲等国家所采取的非源头治理的方式带来应对难民问题,后果会比战争和民主输出更危险;难民不仅是人的移动,还是有文化、价值观

的移动,物质与文明双重冲突将更加突显,进而导致动荡。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情中心田蕾博士认为,为确保区域与全球化经济稳定持续增长,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该战略具有前瞻性,为中国与相关地区国家经济腾飞进行了空间布局。但目前该战略主要还是停留在接洽阶段,实际项目的对接与落实力度不够。而且该战略主要侧重在国家之间经济领域的合作,在其他方面的合作还不够全面深入。对于一带一路的沿线一些国家而言,表现为矛盾的心理,既期盼又害怕——既期盼得到发展,又担心被价值或者信仰整合与利益缺损。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对于加快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要加强国际合作,加强对落后地区的开发与扶持,促进共同发展。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情中心袁赧博士认为,一带一路战略主要从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寻求国家、地区之间的合作共赢,也是我国建立新的国际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途径,相信该战略会为我国人民谋求更多的福祉。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情调查研究中心陆小成博士认为,当前中国经济表现持续走低,增长减速,加上地方债、房价、就业、企业倒闭、结构转型等多方面问题累积,放大了人们对中国经济发展态势的消极判断。实际上中国经济降速是在可控和适度范围之内,既不会表现为国际上说的中国进入长期低迷或者破产的唱衰格局,也不会表现为过去的高速增长态势,而是将保持在一定的增速或者变化区间内进行自我调整,这是中国长期以来粗放式发展和高速增长后的适度降温 and 必然转型。破解当

前中国长期以来积累的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生态等多方面的难题,需要经过一段时期的阵痛或者转型。因此,对中国经济增长不能过于悲观,也不能过于乐观,这种减速和放缓确实是一种新常态。中国通过“全面”战略以及“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等重大举措的推进与落实,在确保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的基础上,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国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对未来中国经济保持缓慢、持续增长态势应该充满信心。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情中心主任、北京世界城市研究基地秘书长唐鑫对本次学术沙龙活动进行点评,并认为正确把握调结构与稳增长的关系,是如何看待当前宏观经济态势的关键。要保持经济健康、稳定增长,所有制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分配结构等都需要调整,但这是一个较长时期的任务,不能操之过急,要符合我国的国情和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实际,以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增长为前提。没有这个前提,调结构将失去社会稳定这个基础。目前,股市、汇市下挫,除去恶意炒作因素外,反映了社会对我国经济基本面存在忧虑,主要是看不清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增长动力在哪里。比如产业结构方面,限制一批产业后新的产业接续不上;消费结构方面,基尼系数依然较大,大多数居民消费观念和消费能力没有实质性提升等。加之简政放权的许多政策、措施没有落实到位,市场缺乏活力。因此,还是要注重投资、消费、外贸协同拉动,注重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现在已经制定了“一带一路”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战略,加快实施这些战略是促进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路径。

关于资本主义的主要思想体系:斯密、马克思、熊彼特

■ 向松祚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上接 9 月 13 日 04 版)

熊彼特:创新、企业家精神和创造性毁灭

1939 年,历经 7 年的深入研究和艰苦写作,熊彼特的煌煌巨著《商业周期》终于问世。书分两卷,长达 1095 页,篇幅相当于通常学术专著四部。熊彼特希望此书揭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基本规律,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动态演化和周期性波动。著作副标题是:《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理论、历史和统计学研究》。他为此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完全达到殒命的程度。他曾经告诉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我反复重读、斟酌和修改手稿,仔细核对每个数据和细节,详尽考察每个事实的时代意义,经常连续工作十多个小时,筋疲力尽,头晕目眩,时常晕厥恍惚,几乎是半死状态!”

举世公认,熊彼特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1883 年,造化巧合,天降斯人。一位伟大思想家——马克思溘然长逝,两位伟大思想家——凯恩斯和熊彼特同年诞生。熊彼特年轻时有三个人生梦想,他立志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最优秀的马术师和最成功的情人。他第三个梦想付出了特别惨痛的人生代价,第二个梦想不了了之,却近乎完美地实现了第一个梦想。熊彼特是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学说的首创者,商业战略思想的首创者,“创造性毁灭”学说的首创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理论”的首创者,马克思经济学的卓越阐释者和著名批判者,经济周期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开拓者,奥国学派经济学第三代最杰出代表,经济计量学会和世界经济学会创始人,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入门弟子包括里昂惕夫、萨缪尔森、詹姆斯托宾等众多 20 世纪经济学顶尖大师。

1911 年,熊彼特时年 28 岁,出版《经济发展理论》,该理论百年来始终为该领域的重要经典。1942 年发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迅即成为全球学术畅销书。1950 年去世之后,经夫人伊丽沙白整理出版的《经济分析史》,一直是经济思想史最权威的巨著。芝加哥学派巨擘雅各布维纳盛赞《经济分析史》“乃是迄今为止,对经济思想最具建设性、最具原创性、最为丰富学识、最辉煌和最伟大的贡献”。

然而,熊彼特内心深处真正的高远理想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运行规律,揭示人类经济体系的动态演化和波动规律。数百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演化和波动历史,波涛起伏、波诡云谲、周期动荡,繁荣、疯狂、危机、衰退、萧条、复苏、再繁荣、再疯狂、再危机、再衰退、再萧条、再复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熊彼特为之吸引,为之沉醉,立志破解“周期波动之谜”。他在《商业周期》序言里写到:“经济周期并非像扁桃体那样,可以与生命机体分离开来,单独处理。相反,经济周期恰像心脏脉

搏之跳动,它不仅不能与生命整体相分离,它本身就是整个生命机体的本质和核心。”《商业周期》详尽分析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世界资本主义数百年演变发展之历史,重心则是美国、英国和德国,它们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发源地和最成熟样板。

概而言之,熊彼特的资本主义动态演化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至少包括 10 个基本命题,它们共同构成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我们反思和重建经济学哲学基础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其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本质上是动态、非线性、非均衡体系,是内在不稳定体系。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完美竞争理论模型完全不能用于理解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熊彼特说:“任何新产品和新商业模式的创造,都必然摧毁所谓完美市场竞争,创新正是资本主义演化发展的内在动力。”

其二,创造性毁灭是资本主义经济动态演化最显著的特征和最生动的表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首次引入“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一词来描述资本主义动态过程,它是熊彼特整个经济学说的代名词。他说:“我们应该用生物学术语来描述资本主义的动态演变。新市场的开拓(国内和国际新市场的不断拓展)和企业制度的创新(从手工作坊和家庭工厂一直到美国钢铁公司那样的超级企业),异常生动地揭示了经济结构的内在演变历程,那就是永不停息地自我革命,永不停息地毁灭旧世界,永不停息地创造新世界。那就是创造性毁灭,它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资本主义之所以为资本主义的核心存在,是任何资本主义企业都必须遵守的生存法则!创造性毁灭就是动态进化和新陈代谢。”

其三,企业、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是资本主义伟大活力的绝对主角。熊彼特以倡导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驰名世界。纵览数百年的历史研究,广博深邃,理论、历史和统计交相辉映,令人信服地证明,资本主义经济正是创新驱动的经济。创新永无止境,创新无限多样,创新无法预测,创新就是创造一个新世界,毁灭一个旧世界。《商业周期》首先勾勒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演化的一般理论架构,主角就是“企业、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商业周期》详尽生动描述了企业之不尽的创业家、创新公司和创业故事,

与当今充满深奥数学公式和莫名其妙数理符号的经济学著作大异其趣。企业、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不仅是开启产业、创造财富、塑造历史的真正英雄,而且是重塑民族文化 and 文明精神的真正力量。总结 19 世纪后期美国的经济发展史,熊彼特如此写到:“从 1865 年到 1901 年,那些入主白宫的美国总统和众多权贵们,早已随风而逝,被人们置之脑后,真正改变美国历史的人物,是安德鲁卡内基、洛克菲勒、JP 摩根为代表的杰出企业家。”熊彼特认为,没有企业、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经济理论,是难以想象和无法容忍的。

其四,企业家或创新者(Entrepreneur)与资本家或投资者(capitalist or investor)具有本质不同,二者之区分或二者能够分离,乃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之一。熊彼特说:“对于任何创新而言,企业家可以是,亦可以不是投资者。人类迄今为止的所有经济制度里,唯有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能够让缺乏资金的人成为创业者、创新者和企业家。对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而言,重要的不是所有权而是领导能力。”熊彼特认为,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分析,有一个共同的致命缺陷,那就是他们没能清楚阐释企业家和创新的极端重要性,没能认识到企业家和创新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特殊重要性。纵观过去数十年来以美国硅谷为代表的风险投资、天使投资和私募基金所创造的惊人奇迹,我们不能不佩服熊彼特的远见卓识和深刻洞察力。

其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是创新和发明之间的本质区别。通过总结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数百年的历史经验,熊彼特认为发明家和企业家、发明创造和企业创新是完全不同的两类活动,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言,发明家的发明创造固然重要,然而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则远远重要得多。历史上固然有许多伟大企业同时是发明家,更多的情形则是,发明家的科学技术发明只有通过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才能转化为巨大生产力和崭新的产业。熊彼特说:“与发明创造相比,将发明创造转化为现实生产活动和现实产业,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熊彼特的精辟见解告诉我们,发明专利之多少不是衡量一国创新精神和创新动力的合适指标,甚至可能是错误的指标。

纵观世界历史,尤其是近 300 年以来人类经济的发展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基本的真理:企业家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主角,企业家精神才是左右人类历史进程的真正力量。凡是跃居世界强国和富国的国家,都可以列出一长串耳熟能详的顶级企业家名单。美国有洛克菲勒、福特、卡耐基、摩根、斯隆、沃森父子、盖茨、乔布斯、埃里森、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德国西门子、卡尔·本茨、戴姆勒、马克斯·弗里茨;日本有涩泽荣一、松下幸之助、本田宗一郎、盛田昭夫、稻盛和夫。这个名字可以列得很长很长。

没有哪个学者能够给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以准确定义。企业家是人类的特殊群体,他们灵感四射、灵动飞扬、激情澎湃、想象丰富、坚毅执着、坚韧不拔;具有敢于超越前人、敢于创造一个新世界、毁灭一个旧世界的超人勇气;具有不畏艰险,敢于承担一切,赢得一切的钢铁意志和心理素质;具有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坚毅品格;具有超越常人的学习能力和变革能力。企业家的许多品质和素质是天赋异禀,非后天学习可得。

我们最多只能简单描述企业家精神的丰富内涵——杰出的领导能力,挑战不确定性和承担风险的决心和意志力,敢于打

破常规的惊人创造性,对经济和产业环境变化高度敏感,能够果断改变战略方向和行动策略……其中最主要的是领导能力和领袖魅力。历史上许多伟大的企业家并不是某个领域的杰出发明家和科学家,却能够将科学家和发明家的发明创造转化为崭新的产业和巨大的财富。我们说爱迪生是伟大的发明家,却不是伟大的创新者和企业家。爱迪生自己经营电器公司近乎惨败,几代企业家却将濒临倒闭的爱迪生公司转化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通用电气公司。创新者和企业家也不是坐拥巨额资金和前辈遗产的资本家,他们往往身无分文,白手起家,独自创立一个商业帝国,开创一个全新产业。19 世纪的洛克菲勒、卡耐基、摩根等等如此,20 世纪和 21 世纪的盖茨、乔布斯、埃里森、杨致远、谷歌创始人、马云、马化腾、李彦宏等等现代 IT 产业的佼佼者,亦是如此。企业家精神所蕴含的杰出领导能力,是一种特殊的能力,就像杰出政治家所具备的那种神奇能力一样,他们能够唤醒和激发民众心中的激情和梦想,心甘情愿追随他们共同奋斗,去实现高远理想。

马克思韦伯曾经将这种神奇的能力称作“奇理斯玛”(Chrisma)。企业家精神就是一种奇理斯玛魔力。乔布斯以“残忍”、“冷酷无情”、“脾气暴躁”、“狂妄自大”著称,却能够吸引无数世界顶级人才为他朝夕奋斗,秘诀就在于他身上那种超乎寻常的领袖魔力。洛克菲勒毕生沉默寡言、神秘莫测、吹毛求疵、待人严厉,却被誉为所有时代最伟大的企业领袖,这种奇特的能力没有任何理论和学说可以解释。必须承认,在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面前,所有的理论和学说似乎都显得那样苍白无力和枯燥乏味。理解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最佳途径只有两个:一是跟随杰出企业家奋斗不止,一是研究杰出企业家的精彩历史。

过去 30 多年来,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世界经济奇迹,最主要的经验就是不断深化改革,激发和鼓励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成长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完善的产权保障,公正的法治制度,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创新容忍失败的社会氛围,富于想象力的教育体系,是激发企业家创新活力,塑造千千万万优秀企业家的重要前提。

面向未来,我国一切经济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都应该以激发和保护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为中心。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是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最宝贵、最稀缺的资源,是最具有能动性和主动性的资源。其他一切经济资源,包括科技、土地、资金、劳力等等,都必须依靠企业家来整合和领导,才能够创造出经济奇迹和财富神话。没有企业家的经济体系,必然是停滞不前、衰退僵化的体系,扼杀企业家精神的制度和体制,必然是毁灭财富、制造贫穷的制度和体制,漠视和蔑视企业家精神的社会和民族,必然要深陷贫困和落后的深渊而难以自拔。这就是熊彼特的盖世才华和毕生努力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选自作者新著《新资本论》第 15 章)(完)

中国国企改革: 回溯、亮点与突破

■ 刘胜军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上接 02 版)

且行且珍惜

《指导意见》的出台历时很久但并未取得足够大胆的思想解放与实质性突破。虽然《指导意见》在放弃国有资本控股地位、员工持股、战略性重组、有股减持等敏感问题上均有涉及,但表述不够清晰,依然留下相当多的模糊地带。在如今官场不作为的氛围下,这样的含糊将成为国企改革巨大阻力和不作为的借口。特别是,如何缓和党管干部与国企市场化之间的“张力”,依然存疑。对防止国有资产、利益输送的概念化警告,又足以令改革者难以施展拳脚。

《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 2015/2016》告诫:“欧盟商会继续支持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但希望看到改革的诚意和对《决定》总体原则的遵守。忽视‘真正的’国有企业改革,会产生《决定》可信度和重要性降低的风险,并且影响未来《决定》的实施”。

但我们又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国企改革是三中全会 60 项改革中难度最大、争议最多的改革,集中体现了思想观念、既得利益的阻隔。我们或许不应指望国企改革有速效药。

思想解放将是决定国企改革命运的关键。就国企改革的理念障碍而言,我们必须就两个问题展开认真的辩论:国企做大做强有利于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有利于中国经济转型吗?坚持党的领导,就必然要强化党组织在国企的作用吗?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需要一场新的思想解放。

国企改革要取得进展,首先要“去意识形态化”,思考一下本源的问题:国企存在的必要性究竟是什么?

很多人会认为,国企不是社会主义的标志吗?其实这是一个误解。马克思在其论著中从来没有主张国企;国企毋宁说是苏联模式的标志,而这一模式已被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搞国企的出发点也许是好的,就像搞人民公社一样,但不符合经济规律。哲学家荷尔德林说“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們试图将其变成天堂”,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警醒。吴敬璠先生回忆说,“现在有人说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前缀,国企就改不成了,我说没有这个道理!以前我就写了一封给党中央的信,叫《关于社会主义的再定义问题》。我就针对“国有制是公有制高级形式,是社会主义必须追求的目标”这个说法。我说这个定义是苏联教科书定义,这个定义是错的。我赞成邓小平的定义,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所以是不是社会主义跟国有制的比重大小没有关系。

荣毅仁之父荣德生 1946 年给国民政府写信说,“若论国家经济,统治者富有四海,只须掌握政权,人民安居乐业,民生充裕,赋税自足。若误入歧途,虽千方百计,终难平稳……能用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不能使用民力,虽一切皆归官办,亦是无用。因官从民出,事不切己,徒然增加浪费而已!”作为民族企业家的荣德生,虽然没有用经济学的语言,但非常朴实地指出了国企存在的必要性。

简而言之,国企的问题在于:(1)有国企就不可能公平竞争;(2)由于所有权的不清晰,国企存在很高的代理成本,常陷于内部人控制和严重腐败;(3)国企与创新、高效不兼容。正是因为在实践中对这些问题的反思,英国在 80 年代开展了大规模的国企私有化,将英国航空、英国电信、英国石油、英国钢铁、国家电力甚至包括捷列、劳斯莱斯的达达企业私有化。到目前为止,以英美为代表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基本消灭了国企,做到了“藏富于民”。

弗里德曼 1988 年来华时曾说:彻底的私有制就是公有制,彻底的公有制就是私有制。这是极为深刻的道理。央企名义上全民所有,但普通民众不仅难以受益反受其害:(1)央企靠行政垄断,不公平竞争,此为与民争利;(2)央企垄断导致电信等服务的高价格,提升民众生活成本;(3)央企陈同海、蒋洁敏式腐败层出不穷,损公肥私。

要啃下国企改革这块硬骨头,我们非常有必要重温邓小平的思想。他在 1992 年的南巡中提出“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国企改革也应该符合三个有利于;国企改革也应遵循三个有利于。如果破除央企垄断符合三个有利于,为什么不能做呢?关于如何正确地坚持党的领导,邓小平在 1980 年《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振聋发聩地说“……关于改善党的领导,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比如,我们历来说,工厂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军队是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学校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如果今后继续实行这个制度,那末,工厂的车间是否也要由党总支领导?班组里边是否也要由党支部或者党小组领导?同样,大学的系是否也要由党总支领导?这样是不是有利于工厂和大学的工作?能不能体现党的领导作用?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可能损害党的领导,削弱党的领导,而不是加强党的领导。”

国企改革能否越过“深水区”,不仅关乎中国经济转型的成败,也会影响到中国参与新一轮全球化竞争。以 TPP 为标志的全球化 2.0 谈判中,国企是一项重要条款,发达国家坚持大量国企的存在将损害公平竞争,损害私营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利益。目前 TPP 13 个成员中,除越南外,都不存在国企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国企改革注定将在博弈中艰难行进,且行且珍惜。(完)